

埃及亚美尼亚人的族群维系及其现实困境^{*}

赵 军

摘 要: 亚美尼亚人在埃及的存在历史较长,但人口规模较小。在复杂多变的历史变迁中,埃及亚美尼亚人通过恪守自治传统、强调族群性、建立自助体系以及重塑历史记忆等多种方式保持族群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长期保留着较为原生的风俗、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等区别于他族的明显特征。这些特点为人们研究在极为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变迁中少数族群如何保持族群原生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当代埃及亚美尼亚人始终面临着被主体民族同化、身份归属两难、人口下降、跨族通婚、政治与安全威胁等结构性困境,这些因素对整个族群的未来存在都产生重要负面影响。

关 键 词: 埃及;亚美尼亚人;族群特征;困境

作者简介: 赵军,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20)06-0140-1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阿盟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路径研究”(19FCJ015)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五批“外国文化政策”研究基地专项课题“埃及中学历史教育中的爱国主义研究”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中肯意见,以及在华埃及留学生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义德·奥比德提供的阿拉伯语资料及译文。

中东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问题曾被视为该地区“仅次于阿以冲突和库尔德问题的另一个复杂的民族问题”。^① 迄今为止,尽管中东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问题并未像阿以冲突和库尔德问题成为显性难题,但流散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埃及等国的亚美尼亚人始终面临着隐性困境,即作为少数族群的亚美尼亚人在与所在国家的主体民族互动过程中,一直面临着被同化、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困扰。

亚美尼亚人在埃及的历史存在时间较长,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埃及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在近代埃及对外关系和经济发展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埃及共和国建立后,亚美尼亚人因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骤降,其部分人口逃离埃及,留守在埃的群体则逐渐远离政治。尽管如此,在穆尔西主政埃及期间,萨拉菲派极端分子将亚美尼亚人视为异教徒予以言语威胁,并试图暴力攻击,使得这一少数族群的安全与生存受到外界关注。

现有关于埃及亚美尼亚人的研究主要有两类成果。一类属于简要的历史记述,主要记录历史上亚美尼亚人在埃及的活动情况,如教育家索纳·S·栽特莲(Sona S. Zeitlian)的《埃及的亚美尼亚人:从中世纪到现代埃及亚美尼亚人的贡献》,该书记述了从阿尤布王朝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亚美尼亚裔杰出人士在埃及政治、军事、经济和宗教等领域的事迹。^② 弗里德里克·米勒(Frederic P. Miller)等人编辑的小册子《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对亚美尼亚人在埃及的历史和现状做了简要介绍。^③ 另一类是较为深入和颇有见地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塞塔·B·达道安(Seta B. Dadoyan)在《法蒂玛时期亚美尼亚人:近东文化与政治互动》一书中用了三章篇幅探讨从1073年至1162年亚美尼亚人同埃及伊斯兰文化互动的复杂历史。^④ 埃及著名历史学者、埃及亚美尼亚人研究专家穆罕默德·里法阿特·伊玛姆撰写的《19世纪埃及的亚美尼亚人》一书集中研究了19世纪埃及政界和贸易中的亚美尼亚人,^⑤而在《埃及的亚美尼亚人(1896年~1961年)》一书中,作者使用大量档案资料,系统研究了在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种族

① 许晓光《中亚美尼亚问题探源》,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第98页。

② Sona S. Zeitlian, *Armenians in Egypt: Contributions of Armenians to Medieval and Modern Egypt*, Los Angeles: Hraztan Sarkis Zeitlian Publication, 2006.

③ Frederic P. Miller, Agnes F. Vandome and Johan McBrewster, *Armenians in Egypt*, Saarbrücken: Alphascript Publishing, 2014.

④ Seta B. Dadoyan, *The Fatimid Armenian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in the Near East*, Leiden: Brill, 2000.

⑤ [埃及]穆罕默德·里法阿特·伊玛姆《19世纪埃及的亚美尼亚人》(阿拉伯文),开罗:努巴尔出版社1995年版。

清洗事件爆发后,亚美尼亚人难民如何在埃开启新生活并将埃及视为家园的社会生活史。^①也有历史学者对近代埃及的亚美尼亚裔杰出人士进行专题研究。如 F·罗伯特·亨特(F. Robert Hunter)在《自我形象与历史真相:努巴尔帕夏与现代埃及的构建》^②一文中,探讨了努巴尔在推进埃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苏莱曼·基兹勒特帕克(Süleyman Kiziltopark)在《奥斯曼埃及官僚体制中的亚美尼亚人》一文中,则重点考察了在奥斯曼时期埃及官僚体系下努巴尔帕夏个人作用的局限性。^③总体而言,现有相关涉及埃及亚美尼亚人的学术成果较为少见,且探讨该群体当前生活状态以及其面临困境的学术成果更为鲜见。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埃及亚美尼亚族群的形成历史、族群维系特点及面临的现实困境等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埃及亚美尼亚族群的历史境遇

一般认为,当代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的形成大致可分为原生型、融生型和外来型等三种类型。原生型一般都经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发展历程,以及有着族群主体的分化或组合。融生型则是少数民族的先辈很早就进入某个地区并与该地区境内的土生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民族。外来型主要指部分外来民族在不同时代迁居某地区而成为少数民族,并未被该地区原生民族同化或融合,仍然保持原民族的基本族群特征。^④基于判断,埃及亚美尼亚人显然属于外来型少数群体,且该族群来到埃及并形成聚落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早在法老时代,就有亚美尼亚人到过埃及的记录。^⑤5世纪上半叶,作为当时重要的宗教、教育和科学之地,亚历山大城吸引了不少亚美尼亚青年人、商人

① [埃及]穆罕默德·里法阿特·伊玛姆《埃及的亚美尼亚人(1896-1961)》(阿文版),开罗:亚美尼亚慈善总会出版社2002年版。

② F. Robert Hunter, "Self-image and Historical Truth: Nubar Pash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3, No. 3, 1987, pp. 363-375.

③ Süleyman Kiziltopark, "Armenians in the Bureaucracy of Ottoman Egypt: The Carrier of Bogos Nubar Pasha (1824-189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Vol. 2, No. 2, 2010, pp. 223-242;

④ 金天明《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类型》,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58-64页;廖杨《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类型及其发展趋势》,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页。

⑤ [美]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郭子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2-123页。

以及同亚美尼亚教宗存在歧见的宗教人士。^① 随着阿拉伯军队征服埃及,瓦尔德·鲁米(Vardan al-Rumi)^②、哈桑·阿玛尼(Hassan al-Armani)^③等大批亚美尼亚裔军官和士兵进驻并主政埃及。但这一时期多数亚美尼亚人只是过客,并未在亚历山大形成固定的族群聚居区。埃及亚美尼亚人社区的正式形成是在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

法蒂玛王朝建立后,王朝政权鼓励对外商贸活动,对基督徒等非穆斯林采取宽容政策,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来到埃及的亚美尼亚人约有三万人,^④并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形成了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和宗教团体。这一时期移民到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大多是勤劳的手工匠和善于经营的商人及其家属,他们在经济方面逐渐显现出自身优势的同时,也较为重视信仰和精神家园的建设。在11世纪和12世纪,亚美尼亚人在开罗、佐埃拉(Zoueyla)、索哈杰、杜拉(Dura)、什纳尔(Shinar)、亚历山大、艾斯尤特、扎格兹格等地陆续修建了数十座基督教堂和修道院。这些宗教场所的建立使得亚美尼亚人的影响力日益剧增,甚至埃及当地人担心他们(亚美尼亚人)会驱逐伊斯兰教信仰。^⑤ 不仅如此,亚美尼亚人在埃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相应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1074年,亚美尼亚人巴德尔·埃尔-扎马里(Badr-al-Zamali)^⑥出任哈里发穆斯坦希尔时期的维齐尔^⑦,他利用一支忠于他个人的“亚美尼亚同胞军”,帮助哈里发快速镇压了塞尔柱人和努比亚埃米尔的叛乱,建立了“埃及的和平”。^⑧ 扎马里也因此埃及掌握实权长达二十余年,其间提拔了不少亚美尼亚人担任政府要职,同时还使维齐尔成为一个可继承的职位^⑨。

1171年,随着法蒂玛王朝的灭亡,亚美尼亚人的厄运降临。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严厉打压亚美尼亚人,将忠于前朝的亚美尼亚人从政府部门全部清除,

① Richard G.Hovannisian, "Ebb and Flow of the Armenian Minority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28, No. 1, 1974, pp. 19-32.

② 此人在641年亚历山大之战中救了阿拉伯军司令阿穆尔·伊本·阿斯的性命。

③ 阿巴斯哈里发任命阿玛尼担任埃及总督(公元841-849年)。

④ Seta B. Dadoyan, *The Fatimid Armenian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in the Near East*, p.166.

⑤ Sona Zeitlian, *Armenians in Egypt: Contributions of Armenians to Medieval and Modern Egypt*, p. 36.

⑥ 此人曾为阿克里总督。

⑦ “维齐尔”系现代埃及学者使用阿拉伯语对古埃及宰相的称呼。

⑧ [美]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第181页。

⑨ 扎马里的儿子沙恩沙·埃尔-阿夫达尔·伊本·巴德尔-埃尔-扎马里之后继承了维齐尔的位置。

解散由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军队,并以突厥人和库尔德人取而代之。“法蒂玛王朝时期的高级金融官员和其他行政官员或被驱逐或被弃之不用,亚美尼亚人的军队被追捕,财产被没收,修道院和教堂被废弃,公开以亚美尼亚人身份进行的集体活动几乎绝迹。”^①1173年,埃及亚美尼亚主教被迫在耶路撒冷寻求避难,有的亚美尼亚人逃离埃及,有的则被迫皈依伊斯兰教或成为奴隶。1192年,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死伤无数。亚美尼亚人基本退出了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舞台。外来亚美尼亚人再次到来并活跃在埃及政治和社会则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1250年~1517年),这一时期来到埃及的亚美尼亚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蒙古征服中亚期间背景离乡逃难到埃及之人^②;另一种是作为奴隶被贩卖到埃及之人,这些人强迫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艺制作,后来在军队服役和在皇宫做保卫工作。^③

1517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埃及后,实行宗教团体自治制度(即“米勒特”制度),使得亚美尼亚人在中东开始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并可以在帝国境内相对自由地迁徙。1615年,开罗只有为数不多的亚美尼亚移民家庭,生活在所谓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Armenian quarter)。之后,尽管奥斯曼帝国对少数民族施行严厉政策,但埃及因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使帝国内其他地方的亚美尼亚人陆续来到埃及。自18世纪初开始,统治者加快迫害少数民族的步伐,大批亚美尼亚人从伊兹密尔(Izmir)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来到半自治状态的埃及安居乐业,亚美尼亚人社区因而繁荣起来。^④亚美尼亚裔珠宝商、枪械制造匠和其他能工巧匠纷纷从君士坦丁堡、提格拉纳克特(Tigranakert)和阿勒颇(Aleppo)来到开罗著名的哈里里市场(Khan-el-Khalili)和希纳汗市场(Hinakhan)。这些人大多数从事珠宝、手工艺以及各类纺织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也有少数同印度、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等地的商人开展外贸业务。

随着欧洲人的到来,18世纪的苏伊士、开罗、杜米亚特及亚历山大等城市逐渐成为国际中转贸易和商品交易中心,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兴盛,亚美尼亚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开始深度参与对外交流,并逐渐成为埃及与欧洲沟通的桥

① Sona Zeitlian, *Armenians in Egypt: Contributions of Armenians to Medieval and Modern Egypt*, p. 67.

② 王三义《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和演变》载《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第35页。

③ “Armenians in Egypt”, *Academic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https://en.academic.ru/dic.nsf/enwiki/1264770/>, 登录时间:2020年2月5日。

④ Rafy Kourouian, “In the land of Pharaohs: The Centuries-Old Armenian Community in Egypt,” *Glendale*, Vol. 10, Issue 4, 1999, p.52.

梁,进而快速步入埃及上层社会,出现了大批亚美尼亚裔外交官和军官。但1789年法国入侵埃及使得亚美尼亚人遭遇重大挫折。法国人废除了亚美尼亚裔商人的经商(尤其是外贸)垄断权,扶植科普特人打压亚美尼亚人。而在埃及各地的反法运动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将亚美尼亚人视为法国人的联盟者而受到暴力攻击。直到法国撤离埃及后,亚美尼亚人的境遇才开始好转,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也才得到相应的恢复。

19世纪初,穆罕穆德·阿里就任埃及总督后,埃及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埃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进入全面改革时期。因受教育程度高以及对外交流经验丰富,众多亚美尼亚人获得了阿里统治集团的重用,担任诸多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位。1828年~1829年的俄土战争为亚美尼亚人资本和人员流入埃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亚美尼亚人之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在金融方面,埃及的亚美尼亚裔货币兑换商和进出口商几乎垄断了埃及的外贸市场和货币兑换业务,同时享有征收国税、工商融资、铸币监管、开设银行以及管理海关等特权。^①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许多亚美尼亚裔顾问、翻译和秘书在埃及总督内阁和国家启蒙委员会(Enlightenment Council of State)及欧洲事务与商务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an Affairs and Commerce)等不同职能部门担任重要职位。当时,埃及专门从事外务和商务的欧洲事务与商务委员会连续多任最高长官都是亚美尼亚人。^②此外,许多亚美尼亚人还在内阁其他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和海外代表等职务。因此,这一时期埃及外务部和商务部被称为“亚美尼亚宫”,亚美尼亚人也被认为是埃及总督府中最有权力的“一群人”。^③在社会方面,埃及的繁荣与开放吸引了大批在奥斯曼帝国内生活贫困的亚美尼亚人。到19世纪40年代初,约有一万名亚美尼亚人在亚历山大和开罗等大城市定居和工作。^④但穆罕默德·阿里被迫退位后,英国利用埃及对抗奥斯曼帝国,导致埃及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和司法

① Yehia Mohamed Mahmoud Ahmed, "The Armenian Immigration to Egyptian in the 19th Century," *Eurasian Multidisciplinary Forum*, October 24-26, 2013, pp. 378-383; [埃及]穆罕默德·里法阿特·艾尔-伊玛姆《19世纪埃及的亚美尼亚人》(阿拉伯文),开罗:努巴尔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2页。

② 1808年至1844期间,伯格夫斯·贝伊·尤素菲(Poghos bey Youssoufian)曾任埃及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内务部和战争部的部长;1844年至1850年,雅克布·阿丁·贝伊·克拉基恩(Yacoub Artin bey Chrakian)任埃及外交部和商务部部长;1850年至1853年,阿拉克尔·贝伊·努巴里恩(Arakel bey Noubarian)曾任埃及商务部长;1850年至1853年和1855至1857年,斯台潘·贝伊·德米尔基恩(Stepan bey Demirjian)两度担任埃及外交部部长。

③ Sona Zeitlian, *Armenians in Egypt: Contributions of Armenians to Medieval and Modern Egypt*, p. 124.

④ Ibid.

等治理能力明显弱化。不少亚美尼亚裔政客(如外交部长、商务部长及其他官员)被迫离职,甚至有部分亚美尼亚人陆续移居国外,到 1854 年,埃及的亚美尼亚人仅剩下 3 000~4 000 人。^①

在经历短暂挫折后,亚美尼亚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 19 世纪中后期再次崛起。伊斯玛仪统治期间,虽受英国掣肘,但在外长努巴尔帕夏^②(Noubar Pasha Noubarian)的努力下,埃及对欧洲政策较为灵活,同欧洲列强关系平稳,营商环境大幅改善,包括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等外国人群体逐渐回流埃及。^③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建设吸引了西亚美尼亚地区的贫民劳工,到 1879 年,埃及的亚美尼亚裔码头工人就至少有 8 000 人。^④

1882 年英国全面控制埃及后,埃及在国际贸易中的区位优势更加突显,加之殖民政权采取粗放式市场经济政策,非穆斯林的经济参与度大幅提升,亚美尼亚人再次活跃在政商两界。在工商业领域,亚美尼亚人占据着重要地位,掌控着埃及 90% 的烟草生产,还主导着埃及外贸,垄断着包括雕刻、锌版术以及珠宝制作等工艺行业,同时在建筑、新闻、冶金、纺织、印染、香皂制作、制鞋、摄影和农业等领域均有不凡表现。仅 1882 年,亚美尼亚人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就分别开张 80 家和 250 家国际贸易商行。^⑤简言之,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埃及亚美尼亚人拥有独特优势,不少人在埃及政府中担任高级职位或在社会中从事体面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奥斯曼帝国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⑥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逃往埃及的亚美尼亚人的数量剧增。仅 1918 年 5 月 9 日这一天,英国船只就向运送 1 500 多亚美尼亚裔难民。^⑦埃及 1927 年人口数据显示,埃及的亚美尼亚人难民总数为 17 188。^⑧难民的到来成为 20 世纪初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口数量激增

① Sona Zeitlian, *Armenians in Egypt: Contributions of Armenians to Medieval and Modern Egypt*, p. 124.

② 1857 年,努巴尔任铁路和交通部部长,1866 年至 1888 年先后四次出任埃及外交部部长,之后三次出任埃及政府总理(1878-1879 年,1884-1889 年,1894-1895 年)和司法部长。

③ Alain Silvera, "The Jews of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5, No. 2, 1999, pp. 172-181.

④ Sona Zeitlian, *Armenians in Egypt: Contributions of Armenians to Medieval and Modern Egypt*, p. 131.

⑤ [埃及]穆罕默德·里法阿特·伊玛姆《19 世纪埃及的亚美尼亚人》(阿拉伯文)第 89 页。

⑥ Stephan Astourian,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Teacher*, 1990, Vol. 23, No. 2, pp. 111-160.

⑦ "Send Armenians to Egypt," *Washington Post*, May 12, 1918, p.15.

⑧ [埃及]穆罕默德·里法阿特·伊玛姆《埃及的亚美尼亚人(1896-1961)》(阿拉伯文),第 214 页。

的主要因素,其职业构成也开始改变,出现了不少亚美尼亚裔建筑师、内科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①

1922年埃及从英国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后,亚美尼亚人的富有阶层被视为英国人的利益共同体而受到较大冲击。在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资本的不断施压下,许多亚美尼亚裔商人被迫离开烟草等主导行业。尽管亚美尼亚人在冶金、纺织和包装业等领域继续保持垄断地位,但原来主导纺织品零售和批发业务的公司规模和数量已大幅缩水。需要指出的是,在一战和二战结束前后,部分亚美尼亚人难民获得了埃及国籍而成为该国公民。但由于苏联在二战中影响力倍增,加之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受巴勒斯坦地区亚美尼亚人回迁苏联的影响,至少有数千名埃及亚美尼亚人陆续回到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②

尽管如此,在埃及革命前夕,埃及仍有4万多亚美尼亚人,^③他们大多生活在开罗的索莱因(Bein el-Sourain)和圭奈纳(Darb el-Guenena)两个区域。1952年革命后,纳赛尔政权推行国有化运动,大部分亚美尼亚人的私产被没收,在私企工作的大批亚美尼亚人随之失业,加之埃及政府不再给予无国籍者公民身份以及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执行驱逐外国人的政策,^④导致大批亚美尼亚人离开埃及。与之前不同,这批外迁者不乏亚美尼亚裔商界精英和众多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很少回归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而是移民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埃及亚美尼亚人的人口数量开始急剧下降。^⑤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政府推行开放政策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留居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开始获得发展机会,其经商天赋得以发挥,从事纺织、五金制品、家具生产、印刷、旅游和化工等产业的亚美尼亚人,或成为成功商人,或成为能工巧匠,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⑥如今,尽管亚美尼亚社区的人口规模较

① Robert Tignor,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Foreigners in Egypt, 1920-1950: From Millet to Hau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3, 1980, pp. 416-449.

② [埃及]穆罕默德·里法阿特·伊玛姆《埃及的亚美尼亚人(1896-1961)》(阿拉伯文),第126页。

③ "Armenians in Egypt," *Embassy of Armenia to Egypt*, <http://egypt.mfa.am/en/community-overview-eg/>,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7日。

④ Dina Ezzat, "Book Review: The Armenians in Egypt, 1896-1961," *Ahramonline*, October 2, 2018,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8/62/312401/Books/Review/Book-Review-The-Armenians-in-Egypt-.aspx>,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7日。

⑤ David Zenian, "The Armenians of Egypt: An Old Community with a Profound Past," *The AGBU Magazine*, March 2005, p. 48.

⑥ "Armenians in Egypt".

小,但较为集中,他们大多生活在赫利波里斯(Helepolis)、诺扎(Nozha)、马阿迪(Maadi)以及赫尔万等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较为富裕的区域。

二、埃及亚美尼亚人族群维系的特点

美国学者特伦斯·E·库克(Terrence E. Cook)认为,“民族身份并不表示自尊,有时也是一种彼此间保护或维持经济利益的方式。也许如果不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任何明智的人都会选择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①埃及亚美尼亚人即是保留自身民族身份的活化石。尽管在历史上经历曲折,但埃及的亚美尼亚人自奥斯曼帝国统治以来总是采取多样化方式不遗余力地守护族群,并使之族群性绵延不绝,至今保持着原生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主要族群特征。

首先,坚持自治,降低政治干扰。1854年奥斯曼帝国允许其境内亚美尼亚人建立自治委员会,埃及亚美尼亚人社区自此有了自治传统,这也使得埃及历届政权并未过多介入该族群的内部治理。1915年埃及政府对沿用的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制度进行修订,明确给予包括亚美尼亚人在内的非穆斯林群体以政治参与权。^②1947年埃及国王法鲁克颁布命令,赋予埃及亚美尼亚人社区的行政自治权。埃及共和国时期,尽管纳赛尔和萨达特政权拒绝科普特人和努比亚人等少数族群在学校课堂上教授本族语言、文化和历史,却不强迫亚美尼亚人在课堂上教授阿拉伯语,并对亚美尼亚的自治少有干扰。亚美尼亚人之所以拥有如此特殊待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亚美尼亚族群人口数较少,在执政者眼中易于同化,且没有给埃及当局带来政治困扰;二是亚美尼亚人的祖居之地亚美尼亚已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而纳赛尔政权和萨达特政权前期均与苏联保持特殊关系。但自埃及共和国建立以来,亚美尼亚人生活实践中的突出特点就是远离主流政治,埃及的亚美尼亚语报刊不宣传政治话题,对地方政治事务也置之不理。很多埃及亚美尼亚人认为,在埃及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要保持族群安全、避免被强制同化,只有一个选择,即远离政治。他们同时认为,去政治化本质上也有助于保存民族团结。^③当前,埃及亚美尼亚人没有议会代表,基本上不参与全国政

^① [美]特伦斯·E·库克主编《分离、同化或融合:少数民族政策比较》,张红梅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② Ceren Belge and Ekrem Karakoc,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Ethnicity, Religion, and 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8, No. 2, pp. 283-284.

^③ Angela Boskovitch, “Photo Essay: Egypt’s Armenians,” *Carnegie Endowment*, September 5, 2015,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sada/?fa=61405>, 登录时间:2020年1月20日。

治选举 极少数参与政治活动的亚美尼亚人也被视为纯属个人行为。

其次,突出族性特征,强化身份认同。埃及亚美尼亚人普遍认为,亚美尼亚语既是其族群身份认同的前提和必备条件,也是该族群强调的关键标识。亚美尼亚人通常认为,失去运用本族语言的能力(指听、说、读、写能力),往往是族群认同弱化甚至消失的先声。埃及科普特人、努比亚人等少数民族已有先例:集体失去了本族语言的运用能力,导致族群独特性缺失。因此,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在培养族人亚美尼亚语的运用能力上可谓殚精竭虑。

埃及亚美尼亚慈善总会主席德吉兹梅德吉恩(Viken Djizmedjian)曾说,“中东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的的确确重视语言(亚美尼亚语),这也是我们为亚美尼亚慈善基金会学院提供亚美尼亚语言课程的原因。”^①一方面,埃及亚美尼亚人突破了宪法规定。埃及宪法规定,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和学校课堂教育教学语言。^②埃及亚美尼亚人在埃及政府默许的情况下,将本族语作为学校第一授课语言和交际语言;另一方面,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或参加族群活动时,埃及亚美尼亚人自觉使用本族语进行生意往来或教会礼拜交流。

如果说亚美尼亚语是埃及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前提和必备条件的话,那么基督教信仰则是他们保持族性特征和身份认同的信仰底色。亚美尼亚人教堂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共有资产,^③。这些共有资产为保持族性信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当代埃及亚美尼亚人始终保持对基督教信仰的忠诚,他们中绝大多数信仰天主教,也有少数信仰东正教和新教,但这些人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始终保持教派和谐,没有因教义分歧而发生族群内斗情况。

再次,建立自助体系,实现有效内循环。多年来,埃及亚美尼亚人引以为傲的是其社区和教会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让该群体组织有序,团结统一。埃及亚美尼亚人的教育、工作和交流等经常在族群社区内就得以完成和实现,该族群也因此经常被穆斯林视为自我封闭且自助式的“国中之国”。其自助体系主要有四

① Angela Boskovitch, “Photo Essay: Egypt’s Armenians”.

② 埃及1923年宪法、1935年宪法、1953年临时宪法、1971年永久宪法、2012年宪法和2014年宪法均有相关规定。

③ 埃及共有五个亚美尼亚人教堂,分别是亚历山大亚美尼亚天主教教区(Armenian Catholic Patriarchate, Alexandria)、圣·格列高利光明会亚美尼亚使徒教堂(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亚美尼亚天主教区和责任教堂(Armenian Catholic Patriarchate and the Church of the Assumption)、索普·克里科尔·卢萨沃里奇亚美尼亚使徒教堂(Sourp Krikor Lousavoritch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和圣·特蕾莎亚美尼亚天主教堂(St. Therese Armenian Catholic Church)。主教是这五座亚美尼亚教堂的主要保护者和管理者,负责如捐赠、农地、房地产以及慈善家赠予的其他财产。

大功能:一是管理功能。亚美尼亚人社区有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本族群的相关事务,该委员会(在埃及当局监督下每 8 年选举一次)由选举产生的 24 名成员组成,负责做出本民族重大事务决议,然后由执行委员会负责落实。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亚美尼亚人教区的各类机构(the Armenian Patriarchate's institutions),包括学校、教堂、墓园、房地产和慈善捐款等。在委员会规划和指导下,执委会积极为亚美尼亚人搭建平台,服务族员,以增强族员交流,强化认同。二是提供社交平台。亚美尼亚人拥有众多机构供本族群人员保持团结、沟通、交流互动和接受教育。以开罗为例,在 20 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就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民用设施并得以全部延续下来。目前,埃及亚美尼亚社区有三大慈善组织、三份亚美尼亚语报刊、七家文化协会、五家体育俱乐部、四家社交俱乐部、两所学校、一个老人之家、八个协助主教工作委员会,以及多个青少年舞蹈剧团、篆刻社、青年合唱团和儿童合唱团。^①三是重视教育。埃及亚美尼亚人极为重视教育。亚美尼亚人学校实行低收费,禁止收取额外费用。如学校经费不足,亚美尼亚教会将会补足差额。如 2005 年著名的卡鲁斯蒂安·瓦尔贾兰学校和努巴尔学校的幼儿园每年仅收费 40 埃镑,其他年级收费 250 埃镑,而同年份的埃及私立学校每学年收费约 6 000 埃镑。^②四是社会救济。因共同的苦难历史和难民经历,埃及亚美尼亚人强调同族互助,并通过建立非政治性基金会实现互助全覆盖。自 1906 年亚美尼亚人帕格霍斯·努巴尔(Poghos Noubar)倡议建立“亚美尼亚慈善总会”(Armenian General Benevolent,AGBU)以帮助同宗难民以来,埃及亚美尼亚人又相继成立“亚美尼亚人红十字会”和“亚美尼亚—埃及救助机构”基金会。上述组织均为埃及亚美尼亚裔知识分子在亚美尼亚难民急需时刻建立的非政治公益性组织,这些组织最初主要为学校和孤儿提供资助,后来发展为所有困境中的亚美尼亚人提供短时资助。^③可以说,埃及亚美尼亚人的族群内自我实现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族群特征延续并使被同化的可能降至最低程度。

最后,重塑历史记忆。有人在详细考察了埃及的亚美尼亚人社区后,做了这样的评论:(它)像一个古老的王朝,保留着其特有的机构,保持着自己文明的集

^① Fayza Hassan, "Armenians in Egypt," *Al-Ahram Weekly*, Supplement, Issue 430, May 20, 1999, p. 43.

^② David Zenian, "The Armenians of Egypt: An Old Community with a Profound Past," *The AGBU Magazine*, March, 2005, http://www.armeniapedia.org/index.php?title=The_Armenians_of_Egypt:_An_Old_Community_with_a_Profound_Past,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2日。

^③ Armenian General Benevolent Union, "About AGBU Egypt," *AGBU EGYPT*, <http://agbuegypt.com/about-agbu-egypt/>, 登录时间:2020年3月2日。

体记忆,并将之经历代代相传。埃及美好时代建设的、至今留存的那些亚美尼亚人俱乐部、学校以及体育设施今天依然对外开放,埃及亚美尼亚人依然有不少活动人士坚守族群遗产,且决心恢复先辈们的遗志。”^①亚美尼亚慈善基金会时刻不忘唤起人们对亚美尼亚人曲折、辉煌和悲惨历史以及祖辈的记忆。除了期望本族群对此关注外,亚美尼亚各基金会还注重外界对该族群的相关研究与宣传。自2002年至今,埃及亚美尼亚人慈善基金会连续17年出资资助关注亚美尼亚人问题的相关研究,旨在培养新一代研究人员,并鼓励他们出版相关书籍和发表论文。

三、当代埃及亚美尼亚人面临的困境

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同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同化通常被视为弱势民族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为了获得保护而采取的一种集体策略,也可能是主体民族借助公权力强迫弱势民族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信仰等族群特征。^②当前,埃及亚美尼亚人虽然未被完全同化,也没有被迫放弃语言文字和信仰等族群特征,其教堂、学校、文化中心和报纸在风云诡谲的埃及政治流变中得到了相对的宽容和良好的保护,官方偶尔还会垂青甚至格外照顾。此外,亚美尼亚人社区至今俨然一个国中之国,有效的共享机构将族众有效团结起来,保护着其少数族群特征。^③尽管如此,当代埃及亚美尼亚人仍面临着残酷而现实的多重困境。

第一,尴尬的社会身份难以根除。埃及亚美尼亚裔著名摄影家凡·列奥(Van Leo)在一次采访中说,在他抵达埃及七十五年之后,仍将自己视为“外人”(outsider),因为埃及民众的身份认同有三个递进层次,首先是主导政治和文化的阿拉伯穆斯林,其次是科普特人,最后才是包括亚美尼亚人在内少数民族的埃及第三类公民(the third citizen)。^④老一代亚美尼亚人不少是在种族屠杀后逃到埃及求生存的。在新的环境中,对许多逃离苦难的人来说,埃及是安全之地,但等待他们的是另外一种灭绝,即在主体文化环境中,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当地文化的

^① Rasha Tarek Habib, “Armenians in Egypt: An Ethnic Minority by Choice,” unpublished MA thesi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airo, 2002, p. 25.

^② 狄金华、周敏《族裔聚居区的经济与社会——对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的检视与反思》,载《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页。

^③ Angela Boskovitch, “Photo Essay: Egypt’s Armenians”.

^④ Akram Zaatar, “The Third Citizen: A Conversation with Van Leo,” *Transition*, Issue 91, 2002, p. 106.

侵蚀。大多老一代亚美尼亚人都将其惨痛的历史记忆作为一生的生命底色,并试图将这种底色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而后代经常显得漠然置之。如今,绝大多数埃及的亚美尼亚族人都是出生在埃及的永久居民,履行着埃及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对他们来说,亚美尼亚只是祖辈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和文化习俗,新老之间存在一种“亚美尼亚人灵魂”式的尴尬。^①此外,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后裔越是融入埃及社会,他们作为亚美尼亚人后裔的感觉就越强烈,甚至对亚美尼亚文化更为重视,即使他们对亚美尼亚文化知之甚少,这种代际变化正在从“成为亚美尼亚人”转变到“感受亚美尼亚人”。^②但在埃及穆斯林眼中,埃及亚美尼亚人则是披着异域文化外衣的埃及人^③,如亚美尼亚人选择性地进入埃及社会,成为埃及公民,但长期以来埃及社会始终拒绝跨信仰婚姻。

第二,人口持续下降难以有效阻止。埃及共和国建立以来,纳赛尔时期的公有化运动对埃及亚美尼亚人造成的冲击最大,导致该族群人口数量下降 60% 左右。1977 年埃及亚美尼亚教区大主教扎温(Archbishop Zaven Tchintchinian)曾感慨说,“感谢上帝,移民已经停止,年轻一代正在恢复”。^④在过去的 40 多年中,埃及亚美尼亚人基本维持在 5,000~7,000 人的规模,^⑤但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由于赴国外机会较多,海外关系网络强大,出国定居的情况日益普遍,特别是埃及“1·25”革命后国家经济状况恶化,埃及亚美尼亚人移民西方国家已成为难以阻挡的趋势。尽管亚美尼亚人社区至今仍声称人口数量相对稳定,但由于埃及承认双重国籍,拥有双重国籍的亚美尼亚人日益增多,在埃定居的亚美尼亚裔人口数量下降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可从近年来亚美尼亚人学校在校生人数得到旁证。据统计,埃及亚美尼亚语学校的学生数和班级数已大幅下降,有的中学高年级每个班级甚至只有一名学生。有 140 年历史的卡鲁斯蒂安·瓦尔贾兰学校(Kaloustian Varjarian)也只有 50 名学生,而该校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有 900 名在校生。2012 年,这所学校被迫并入赫里波利斯的努巴里安学校(Nubarian School),该校在合并前也仅有 145 名在校生。亚历山大的亚美尼亚人学校博夫

① 纪实小说《泽贝莉》的主人公泽贝莉的儿子觉得自己与亚美尼亚存在关联是一种尴尬,而泽贝莉在临死前用亚美尼亚语对孙子说,“我的生命就像摔破了的碗”,她的孙子不懂亚美尼亚语,而她用英语又表达不出本来的意思。参见贾明航《亚美尼亚人的灵魂》,载《读书》1997 年第 7 期,第 133-135 页。

② 刘冰清、石甜《族群离散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载《学术探索》2012 年第 2 期,第 51 页。

③ 笔者采访了多位在华埃及留学生,他们认同这一点。

④ David Zenian, “The Armenians of Egypt: An Old Community with a Profound Past”.

⑤ Angela Boskovitch, “Photo Essay: Egypt’s Armenians”.

学校(Boghosian School)只有27名学生,而最为有名的一所亚美尼亚人免费学校卡洛斯迪安—努巴里安亚美尼亚语言学校(Kalousdian-Nubarian Armenian School)从幼儿园到12年级总共才150名学生。随着埃及其他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通婚日益普遍,该校打破了只招收亚美尼亚人家庭孩子的规则。^①因此,单纯从人口减少的情况来看,埃及亚美尼亚人的未来极有可能如埃及亚美尼亚裔作家哈鲁特在穆尔西执政时期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埃及的亚美尼亚社群看似很安全,但它正在为应对国家的不确定性而挣扎,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同胞们需要更为广泛的援助,如果继续向外移民,那么这些曾经活跃的社区将会变为鬼城。”^②

第三,族性弱化情况日益突出。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族际互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弱小族群的族性弱化甚至最终丧失。当代埃及的亚美尼亚人族性的弱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跨族婚姻。有调查显示,第三代亚美尼亚裔年轻人仍在亚美尼亚社群内选择生活伴侣,但有时也会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社群选择适合的配偶。但在埃及大学校园中,亚美尼亚裔青年人融入埃及主流文化,已经尝试从社区外选择配偶,如从科普特基督徒中选择伴侣。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亚美尼亚人冒险选择穆斯林为终身伴侣的例子。二是亚美尼亚语的单一母语地位逐渐丧失。埃及共和国建国后选择留下来的亚美尼亚人,大多是能工巧匠、富有眼光的企业家以及有着纯熟生存技能之人。他们逐渐意识到需要放弃族群的自我认知,并将社区塑造为埃及社会的一部分。在纳赛尔时期,亚美尼亚人学校就曾鼓励新生代放弃亚美尼亚语的地道发音,如今60岁以下的亚美尼亚人几乎无人能够说地道口音的亚美尼亚语了。此外,埃及三份亚美尼亚语报纸的总发行量也在急剧下降,目前已降低到1,000份,读者人数也已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大多亚美尼亚裔使用亚美尼亚语和阿拉伯语等双语情况趋于正常。“你要问我的第一语言是什么?我很难解释是如何掌握亚美尼亚语和阿拉伯语这两种第一语言的。”^③随着亚美尼亚人机构所募资金越来越多,各大亚美尼亚人机构相当富足,经常将亚美尼亚儿童送到国外学习,这也使得亚

① 参见 Angela Boskovitch, “Photo Essay: Egypt’s Armenians”.

② Harut Sassounian, “Armenians in Egypt Dwindling yet Resilient in a Country in Turmoil,” *The California Courier*, May 20, 2012, <http://asbarez.com/102989/armenians-in-egypt-dwindling-yet-resilient-in-a-country-in-turmoil/>,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5日。

③ Thomas Gorguissian, “On Being an Armenian and an Egyptian,” *Al-ahram Weekly*, Issue 1410, September 20–26, 2018, <https://weekly.Ahram.org.eg/News/25546.aspx>,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3日。

美尼亚语作为单一母语受到严峻挑战。^①

第四,政治和安全困扰挥之不去。在近代埃及历史演进中,尤其是共和国建立后,埃及亚美尼亚人始终受到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信仰的双重冲击。整个纳赛尔政权时期,埃及狂热的民族主义造成民众对少数族群的敌视。曾任《阿勒夫日报》编辑的埃德蒙·Y·阿扎丁(Edmond Y. Azadian)在三十年后的回忆中写道:“只要我们的社区在与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关系存在任何的亲近表示,政府就会对我们亚美尼亚人采取谨慎的态度。来访的(亚美尼亚裔)政要、艺术家、神职人员和作家都会受到密切关注。”^②这也是亚美尼亚人在共和国政权建立后至今选择隔都式的生活的重要因素。

尽管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对微型少数族群的控制大幅放松,但埃及的亚美尼亚人仍对政府保持较高警惕。穆尔西执政时期,长期远离政治的亚美尼亚人社团对穆尔西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公开表达不满,^③但开罗亚美尼亚人社区很快遭到萨拉菲极端分子的暴力攻击。这也是后穆巴拉克时期亚美尼亚人向外移民增多的主要原因,进而影响到该族群的整体存在。此外,亚美尼亚人还时而被迫卷入埃及对外关系处理中,每当埃及和土耳其交恶时,就会牵扯到如何认识奥斯曼政府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历史,使得亚美尼亚人不得不做出感恩埃及、憎恨土耳其的姿态。^④因为,埃及政府始终认为埃及是这场大屠杀期间亚美尼亚人的避风港。正如埃及现任议员塔拉阿特·哈利尔(Talaat Khalil)所言,“自1915年以来,埃及始终是亚美尼亚人的避难所”。^⑤不仅如此,当前塞西政府为了拉拢少数族群,也为埃及亚美尼亚人提供一些微薄服务,如教育金、老人年活动室以及医疗、补助金和社会福利计划,这在无形之中成为消解亚美尼亚族自助体系和介入其内部自治的手段。

① Edmond Y. Azadian, “Minorities in Egypt,” *The Armenian Mirror-Spectator*, December 5, 2012, <https://mirrorspectator.com/2012/12/05/minorities-in-egypt/>, 登录时间:2020年1月4日。

② Ibid.

③ Nanore Barsoumian, “Amid Turmoil, Armenians of Egypt Remain on Sidelines,” *Armenian Weekly*, August 25, 2013, <https://armenianweekly.com/2013/0825/amid-turmoil-armenians-on-the-sidelines/>,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4日。

④ “Egypt’s MPs Urge Parliament to Recognize Armenian Genocide,” *Middle East Observer*, July 26, 2016, <https://www.middleeastobserver.org/2016/07/26/egypts-mps-urge-parliament-to-recognize-armenian-genocide/>, 登录时间:2019年12月18日。

⑤ “Egypt’s MPs Urge Parliament to Recognize Armenian Genocide”.

四、结语

埃及亚美尼亚人为我们研究在极为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变迁中少数民族如何保持族群原生性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前文仅考察了亚美尼亚人在埃及的基本历史活动、保持族群延续的主要方式及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可以说,埃及亚美尼亚人随着埃及的历史变迁几经浮沉,铸就了该族群保持族性特征的独特方式,这也使得当代埃及亚美尼亚裔在极为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族群特征:强烈的族群认同、有效的自助体系、远离主流政治和重塑历史记忆等。

经过数代发展,埃及亚美尼亚人族群性的基石已经从血缘继嗣和婚姻作为维持手段转变到其他方面,过去曾经为族群成员提供基本信仰的教堂,如今更多地成为离散和家园故土的一个象征物。同化现象始终是埃及亚美尼亚人挥之不去的影子。一方面,他们为失去家乡而悲痛,为身为亚美尼亚人后裔而骄傲;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获得承认,他们不得不学习阿拉伯语、埃及社会的传统习俗和文化。

但埃及亚美尼亚人面临的困境属于结构性难题,这些难题彻底解决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大量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表明,在民族国家内部,在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互动过程中,其结果要么是与主体民族分离,要么被主体民族同化,或是同主体民族保持一定程度的融合。显然,对于埃及亚美尼亚人来说,未来这三种结果发生在该族群身上都不奇怪。从当前情况看,由于埃及亚美尼亚人的不断向外移民,这在相当程度上使部分亚美尼亚人实现了同主体民族的和平分离。随着人口的减少、双语的普及以及跨族通婚等导致族性不断弱化,部分亚美尼亚人可能会被完全同化和融合。因此,未来埃及亚美尼亚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或聚落整体存在能否长久维持下去,在不考虑埃及政府采取强制性同化政策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国内的亚美尼亚人继续恪守传统与坚守特性,更要取决于埃及本土之外的亚美尼亚人能否回流。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李意)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07 On Islamization of Somalia 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Arabic Identity

Abstract The spread of Islam in Somalia is accompanied by the process of “Arabization”, which has shaped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Somalia to a certain extent. Islam was introduced to Somalia by Arab immigrants at the end of the 7th century AD. Mogadishu, an Arabized city state, was formed, and Islam spread to the interior of Somalia. Zella and Berbera which located on the coast of the Gulf of Aden, are the center of Islam spread in the north. In contrast, Islam spreads slowly in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it mainly relies on the mission of Arab saints in some legends. In the 14th century AD, the coastal cities of Somalia basically completed Islamiz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Somali native ulemas grew up, and spread the Islam to the inland tribesmen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Sufism, which promote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ufism and tribal society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s. More importantly, some Somalis began to reconstruct their own lineage and traced it back to the early Arab immigrants, the ancestors of Sufism, that is, Hashemite. This has become the origin of Somali Arab identity since modern times,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Somalia.

Key Words Islam; Somalia; Arabic Identity; Sufism; Tribe

Author YAN Wei, Ph. 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124 Egypt's Employment Plight in the Mubarak Era and its Causes: On the Resolution of Employment Problems in Current Egypt

Abstract In the Mubarak Era,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employment in Egypt: unbalance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women and young people have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jobs;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unpaid workers are prominent. The employment predicament in Egypt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ree core factors: population expansion, 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imbalance. The Sisi government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Mubarak authorities and improved employability through various means, including vigorously attracting investment,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e and manufacturing, continuing to develop the private economy, supporting small,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lthough these measures have achieved some results, they have not yet fundamentally solved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employment problems. The solution to the employment dilemma in Egypt still requires long-term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Key Words Egypt, Mubarak regime, Employment, Sisi government

Author CHEN Tianshe, Ph.D., Professor, History of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HU Ruizhi, Master Candidate, History of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140 The Ethnic Inheritance and Contemporary Dilemma of the Armenians in Egypt

Abstract The Armenians in Egypt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and a long history of existence. In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historical changes, the Egyptian Armenians have maintained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ir ethnic groups by abide by the tradition of autonomy, emphasizing ethnicity, establishing a self-help system, and reshaping historical memory. They have long retained their original customs,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Contemporary Egyptian Armenians are alway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structural dilemmas such as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main nation,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population decline, inter-ethnic marriag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threats, and these factors have an import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uture existence of the entire ethnic group.

Key Words Egypt; Armenians;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y; Dilemma

Author ZHAO Ju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